



学历低 资历浅 年轻低薪族 走不尽“穷忙”路

派送员想找全职工买房 “照顾孩子需求最重要”

在新加坡，未满40岁青年的生活长期陷入穷与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本地全职劳动力月入的第20个百分点为2200元，是收入最低五分之一群体的薪金水平。全国工资理事会最新加薪指导原则建议，给这一群体加薪5.5%至7.5%，或至少80元至100元。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本地部分低学历年轻人属于这一低薪层，他们有固定工作但生活捉襟见肘，钱和时间都不够用。

本期《实况报道》探讨“穷忙族”面对的挣扎，了解政府采取的援助措施，也请学者提出建议——如何从政策、雇主，以及社会服务层面，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回忆当年20来岁时一人打两份工，每月有四五千元入袋，包裹派送员伊哲（化名，左图，38岁）对如今月入1000元左右，备感无奈。

年少时无心向学的伊哲，2001年在工艺教育学院仅上了一年的建筑服务Nitec课程就辍学。

服完兵役后，他凭技能申请到一份在机场当技术员的工作，薪水2700元，对当时的他来说，已相当可观。加上他晚上到夜店当巡场，每月可赚四五千元。

四五年后伊哲被辞退，丢了技术员的工作。他过后在一家酒店当技术员，但因人事纠纷而辞职。他决定专注当夜店巡场，日子算得过去。然而在2014年，雇用他的公司无法与夜店续约，他再度失业，顿时感到茫然。

伊哲后来结婚生子，决定结束日夜颠倒的生活，但由于学历低，他只找到月薪55元的保安员工作。

四年前，他发现平台工

作似乎有赚头，转行当派送员。“起初我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可赚约3000元，但2019年起更多人加入，竞争激烈，平台调整佣金制，后来每月只能赚一两千。”

他和妻子育有六名子女，年龄介于六个月至6岁。一家人住在租赁组屋，过去几年申请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每月获得一两千补贴，但每隔几个月得重新申请。他们每月也获基层组织和非盈利机构的粮食救济。

伊哲最近改当包裹派送员，在自己社区内送包裹。明年最小的儿子托儿所后，他打算找一份全职工，也不排除上课提升技能，当回技术员。他希望有一天能购买自己的组屋，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但不会在孩子面前显露。如今最重要是照顾孩子的生活需求，我自己缺什么倒无所谓。”（蔡家增摄）

实况报道

许翔宇 hsiangyu@spn.com.sg
卢慧菁 fcloo@spn.com.sg

失业者或中年转业者陷入困境的问题长久以来受决策者和社会关注，不过本地职场还有另一群弱势者，即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年轻资历浅和学历低的双重劣势，容易陷入“穷忙”的窘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服务研究中心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进行一项关于青年陷入“在职穷”（In-Work Poverty）的大型研究。

研究团队访问1905名自2017年开始工作、年龄介于21岁至38岁的公民。他们的教育程度分四类：大学文凭或更高、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工艺教育学院，以及中学或更低。研究聚焦于低收入青年，他们都住政府组屋，约四成属于低薪阶层。

研究发现，拥有工教院或更低学历者，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介于3300元至3500元。他们一般从事技术和辅助专业人员、销售及销售员、机械操作员等工作。当中，11%属于平台人员，即送餐员或私召车司机等，面对低薪和职业前景欠佳等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以月薪中位数来说，拥有工教院学历的受访者，与中学或更低学历者无区别，同为2000元。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在这项研究中，持工教院证书学历者稍微较为年轻。

持大学文凭或更高等学历的年轻人，收入比其他学历组别明显更高，月薪和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分别为4200元和8000元。

领导这项研究的国大文学暨

社会科学院社工系副教授吴瑜虹，上个月底在一场题为《努力工作也不够》的对话会上分享研究成果。活动由宏茂桥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与马来西亚饼干制造商Julie's发起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最好的你”（The Best of You）社会运动联合举办。

吴瑜虹说，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与学历和收入较高的同龄人相比，更容易面对“时间不够用”（time poverty）的挑战。

他们当中，有些工时非常长，每天超过10小时，还须轮班或在周末假日工作等。由于工作性质等因素，他们无法掌控时间，更无法在上班日抽空进修。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自我提升的年轻人也会因没时间或没有能力承担费用，而无法参加有助提升技能、改善就业前景的课程。

“如果薪金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可通过进修，进一步提高收入，而低学历的同龄者却不大能够这么做，社会不平等现象会进一步加剧。”

改善年轻低薪族待遇 政府应扮演领导角色

由于年轻低薪员工的议价能力有限，吴瑜虹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强调，政府应扮演领导角色，与雇主合作增加他们的培训参与度、提高他们的薪金，以及改善工作条件。

“政府在这方面须带头，主要因为雇主占主导地位，由市场来决定如何制定薪金的方式已失灵。此外，加强培训可为社会带来不少利益。”

在吴瑜虹看来，这些年轻员工的工资过低，有必要纠正。“加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

不同教育程度年轻就业者每月总收入（包括雇主缴交的公积金）

	中学或更低	工教院	专业文凭或A水准	大学文凭或更高
平均收入(元)	2221	2104	2829	4753
收入中位数(元)	2000	2000	2600	4200

不同教育程度年轻就业者家庭月入

	中学或更低	工教院	专业文凭或A水准	大学文凭或更高
平均收入(元)	3619	4134	5554	8733
收入中位数(元)	3300	3500	5000	8000

资料来源：国大社会服务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年轻人的工作贫穷和生活挑战：第一阶段研究——年轻就业者工资、职业、工作条件，以及身心健康》（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

（WIS）及扩大渐进式薪金模式（PVM）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而且必须加快推行。政府也更应积极推动雇主在制定业务目标时，将员工福利纳入计划。”

政府在明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明年起扩大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涵盖范围，合格月入上限将从2300元调高至2500元，可受惠的低薪员工人数也会从目前的35岁降低至30岁。

此外，今年9月1日起，渐进式薪金模式扩大至零售业，以及公司内部清洁工、保安人员及从事园艺工作的全职雇员。外包清洁、保安、园艺、电梯与手扶梯领域雇员，已从2014年至2019年陆续纳入计划。

吴瑜虹建议政府和雇主加强合作，为低学历年轻人推出合适的课程，并且提供职业发展的培训，以及通过自动化或重新设计工作程序等方式，让员工有时间去上课。此外，政府也可与社会服务工作者携手，提高给予年轻低薪员工的职业辅导。

针对平台人员目前不受雇佣法令保护，也无法从渐进式薪金

模式中受惠，吴瑜虹呼吁政府加快步伐，落实新措施保障这些员工的福利和权益。

人力部平台人员咨询委员会刚在11月23日提呈一系列建议，包括规定30岁以下的平台人员须缴交公积金。建议获政府接受，最早2024年底生效。

吴瑜虹说，决策者长久以来关注较年轻员工，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个群体面对失业和事业停滞的风险。然而，这项研究凸显年轻低薪者也面对风险，若不协助他们应对挑战，日后他们可能成为须要政府援助的群体。

另一方面，研究指出，参与者的职业地位、薪水及工作条件的差异，不能纯粹归咎于教育程度。不过就统计学而言，不同学历者在这些指标的数据差别显著，显示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在工作条件和薪金等方面，更容易处于劣势。未来研究或可长期跟进年轻低薪者，深入了解他们工资、职业等方面的发展轨道。

这份研究获教育部的社会科学专题研究津贴资助。

接线员考虑读专业文凭 为自己和孩子打拼未来

单亲妈妈蕾拉（33岁）两个月前开始新的接线员工作，这是她投入职场16年来首次月薪超过2000元，也是第一份无须轮班的工作。

正在和丈夫办离婚手续的蕾拉，有一对3岁和9岁的女儿。已和她分居的丈夫，没有给任何赡养费，但答应平日照顾孩子，她才能接下这份工作。

蕾拉2007年从工教院电子科技国家教育局证书（Nitec）课程毕业后，随母亲到工厂打工，没有升学。她后来投入保安和客服行业，曾有不错的发展，但碍于学历，最高工资只徘徊在1900元左右。

“我曾在一家健身房当前台客服人员，起薪约1700元。我的工作表现优秀，升为高级客服人员，还分担经理的部分职务，但薪水总无法突破2000元。”

公司虽派蕾拉去上课提升技能，但这对她加薪的帮助不大。加上她得轮班，因此没想过读专业文凭课程。

她约四年前怀上第二胎后决定辞工，相夫教子。岂料不久后，婚姻亮起红灯，丈夫前年抛下她和孩子，迫



蕾拉在社会服务中心和宏茂桥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找到月薪2000元的接线员工作。（梁焜焜摄）

使她得重返职场，当起包裹派送员。一连串打击，让低学历低薪的她，生活陷入困境，必须到社会服务中心和宏茂桥家庭与社区服务中心申请经济援助。

目前，蕾拉当接线员的薪水虽有2200元，但由于还得付预付租屋房贷，到了月中钱已不够用，薪水往往只剩100元。“生活压力常把我压得透不过气，孩子是我继续撑下去的最大动力。”

如今工作时间固定，她在考虑报读专业文凭课程，以争取更高工资，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打拼。

工教院毕业生职业和薪金 与学历更低者相近

接受研究团队访问的工教院毕业生当中，有不少从事的职业，与学历更低的非工教院毕业生相当类似，工资也没有明显更高。这意味着，提升工教院毕业生薪金和职业前景的工作，仍然至关重要。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上个月在第14届新加坡经济政策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对工教院和理工学院与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差距扩大表示担忧。他指出，本地经济仍过度看重认知能力，也就是被视为靠脑力的工作（head work），而没让从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得到足

够的重视，如更需要手艺或心件的服务业和社区关怀职务。

过去六七年，工教院毕业生起薪中位数在1700元左右，去年上升至1800元，但与大学毕业生的3800元差距相当大。

学历更低者更可能 申述有心理疾病症状

国大副教授吴瑜虹认同黄循财的观点。她认为，要提升年轻低薪员工的薪金，人们除了要改变观念，也须从政策和推行有效培训课程方面推动。以工教院毕业生来说，她认为，关键是要提升他们的就业

能力，以及对他们的价值给予足够肯定。

“我们进行的研究中，许多从工教院毕业的青年从事服务、销售、文书及送货等工作。学历比工教院低的也在从事这些职业。”

“接下来，自动化和数码化科技更普及，即使这些工作岗位不须要那么多人力，我们仍需要有人从事这些工作……渐进式薪金模式对提升低薪员工的工资可发挥作用，而社会大众和雇主也须认为有必要这么做。”

另一方面，这项探讨在职

贫穷的研究，也要求受访者评估自己的心理状况。研究发现学历较低的青年，更有可能会有心理疾病症状。

数据显示，拥有中学及更低学历者当中，约13%曾出现过重度抑郁症状，在所有学历组别中的比率最高。其次为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9.42%），以及工教院学历（8.93%）。拥有大学文凭及以上者的比率最小，约为4%。

研究强调，评估显示的是受访者面对心理状况的可能性，并非心理疾病诊断工具。在自我效能感，即对于凭

自身能力达成目标的信心度方面，拥有中学及更低学历者的平均分，比其他学历组别明显较低，在满分5分中取得3.7分平均分。专业文凭或A水准证书（3.84），以及工教院学历者（3.82）的分数不相上下。大学文凭及以上学历者的自我效能感最高，为3.91分。

此外，面对冠病疫情，不同学历年轻人承受不同程度的影响，低学历者更常遭遇收入减少、裁员或停工等状况。

研究发现，受访者中，四成因工作性质不允许，从来没有远程办公，当中以低学历者

居多。这意味着，居家办公等灵活工作安排即使普及化，对这一打工族在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方面的作用不大。

根据《教育统计摘要2022》数据，多数学生升读中学后教育；在N水准学生中，2011年至2020年比率介于92.4%至97%；O水准学生近年近99%。这意味着拥有中学或更低学历者目前属少数。

至于工教院，近几年每年有约1万3000名毕业生。每10名国家教育局证书（Nitec）课程毕业生中，超过七人继续进修更高学历。